

【城市经济研究】

城市经济活力:特征、评价体系与提升建议

王小广 刘莹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城市的竞争力上,城市的活力带来了国家的活力。尽管城市经济活力备受关注,但是由于其复杂的内涵也造成现有研究较少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城市经济活力具有集聚力、创新力、市场活力、韧性以及辐射力等5个主要特征。要提升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活力,需从更多注重微观上升到更多注重中观和宏观,使微观与中观、宏观结合,特别是要着眼力于优化城市整体环境,激发城市的整体活力,让城市间开展最广泛也最有效的活力竞争。

关键词:城市经济活力;集聚力;指标体系;“五个友好”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1-0130-09 收稿日期:2021-07-22

作者简介:王小广,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刘莹,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89)。

经济缺少活力是当前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王小广等,2020)。如中国南北差异的扩大主要源于经济活力的差异,特别是城市经济活力的差异。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要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到施罗德公布“全球30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Schroders Global Cities 30 index)排名,国内外各方面高度关注微观经济活力问题,因为活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发展阶段,活力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在全球城市化率已超过50%、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3.9%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国家内的区域竞争和大国间竞争的中心就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各种生产、生活要素不仅会继续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而且因集聚力、城市环境的差异会使城市间产生巨大的活力差异,进而导致国家内区域活力分化、国家间总体活力的分化。可见,区域发展、国家发展,就是培育城市活力。因此,需要深入剖析城市经济活力内涵、科学设计评价城市活力的指标体系以及如何从宏观上优化城市环境等。

一、城市经济活力特征

“活力”一词源于物理学,由莱布尼茨提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包括:旺盛的生命力;行动上、思想上或表达上的生动力;朝气蓬勃,刚劲有力等几种含义。但是,当其被引入经济研究中,就现有文献来看,不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学术文章,都没有给出标准的定义,常是直接使用“活力”一词,而究竟什么是“经济活力”?人们通常能感知到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但又无法说清。笔者对现有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活力”的界定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

定性研究主要认为活力是一种能力或者潜力。较早出现的是1995年王延中给出的经济活力定义,认为“经济活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和能力。像楼海森等(2005)及金延杰(2007)认为“活力”是城市、区域或国家对于生命机能、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支持程度,也都强调活

力是一种能力。而在Sun、Tipton(1998)的研究中则认为活力是潜力,并将中国市场形容为有活力的市场。

定量研究注重以变化率来界定活力,让活力由抽象变得具体。与定性概念相同的是,都强调经济增长,孙津(2003)采取了以定量的方式将经济活力定义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因为“活”也有变化速度快的含义,所以,也有大量的学者从速率、效率的角度出发对经济活力进行定义,包括年增长率(孔淑红等,2005),或者以经济运行效率来表示(蒋涤非,2007)。

从现有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经济活力是经济产出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既可以是指当前经济体或单位已经形成持续快速增长的能力,也可以认为,尽管当前未见产出持续快速增长,但未来高成长潜力巨大。

中国早期(如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文献中,对经济活力的研究比较强调微观层面,即企业活力,对城市活力研究较少,而费孝通等从市场活力角度关注城镇与区域的活力。现在许多学者重视城市发展及城市活力的研究,并使经济活力研究的重心由微观层面转到中观或宏观层面。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尽管没有形成完整、公认的有关城市经济活力的定义,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认为经济活力或城市经济活力是支持经济体发展的能力,一般以经济增速或空间扩大等来表现,这也造成了现有对于经济活力以及城市经济活力的研究偏重于经济活力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上,没有深入挖掘经济活力的全部特征。笔者认为城市经济活力是支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集聚力、创新力、市场活力、韧性以及辐射力等5个主要特征。

1. 城市经济活力产生于集聚力

集聚力体现的是各种要素大量充分的流动,形成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随着集聚力的增强而显著提高。增长极一般会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形成,其形成的过程中,增长初期主要体现的就是集聚效应,各种要素规模化集聚与交互作用,自然会产生活力,从而推进经济体快速成长,而经济持续成长又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经济活力水平。强大的增长极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发展能力,就是因为经济活力往往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创新等,形成报酬递增的趋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能得到显著提高。

2. 城市经济活力依靠创新力来维持

经济是否有活力的重要判定之一是经济产出是否增长,但是,根据经济理论分析,因为要素报酬存在着边际递减,所以这种产出的持续增长必须来自创新。经济增长若没有创新所带来的质量提升,就属于粗放外延的增长,最终会停滞增长。所以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经济衰败就因为创新的停滞。而创新高度依赖于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是局部嵌入的现象,所以不同地区创新效率不同,经济活力也有所区别,经济增长也就有差异。如果没有接续的创新活动,城市或地区就会出现衰败,出现像美国底特律等“铁锈地区”或者中国的“东北现象”。在区域发展上,创新力是与集聚力紧密相连的,集聚力是创新力的基础,集聚的要素越多,信息交流也会越多,就越能产生创新的机会,从而激发更大的活力。

3. 城市经济活力以市场活力为基础

市场活力主要强调的是企业的活力。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此时城市中企业的的重要性便已经开始体现,它们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承担者。可见,纵使政府引导作用不可忽视,但如果缺少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市场主体基础,国民经济也会出现活力不足的现象。

4. 城市经济活力以韧性为保障

城市或区域作为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自其形成以来便持续地遭受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各种冲击和扰动。这就需要有韧性来保障城市或区域不受外界干扰。韧性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演化韧性。工程韧性主要的含义是在受到冲击后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生态韧性的含义是受到冲击后能够形成新的平衡;而演化韧性认为韧性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能力。尽管三种韧性有所区别,但是总的来看,韧性的内涵在于保持稳定和适应。在城市经济时代,城市的发展韧性强弱也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强弱,一方面城市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又要极具灵活性地根据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经济发

展方式,避免活力衰竭、走向衰败。

5.城市经济活力可以产生辐射力带动周边发展

在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中,都阐述了区域通过集聚形成增长极,在自身发展达到了起飞阶段后,通过辐射的方式将技术、资本等其他经济要素向周边传递。接收到增长极传递的资源后,腹地与过去相比也集聚了更多的资源,提升了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活力的提升。这一过程中,周边地区仍然会持续向增长极输送资源等,也就是同时发生双向的辐射,增长极会持续通过集聚增强自身活力并辐射更大范围,实现更广泛的区域协同发展。

二、城市经济活力评价体系

在城市经济活力研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科学设计城市经济活力评价体系,以便对国家内、国家间的城市活力进行综合评价。当前,城市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上存在以下难点:一是对于什么是城市经济活力的关注点在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现有的指标体系多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变形。但是活力的含义远大于此,因此需要把指标选择扩展到更宽广的范围。二是简单的指标难以反映经济活力的深刻含义,使用过多的简单指标堆砌来增加指标数量将会失去指标的针对性,过于烦琐的指标又在数据获得上加大了难度。上文中已经分析过城市经济活力的关键在于集聚力、创新力、市场活力、韧性和辐射力。本文将基于这5个特征,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可操作性等问题,构建一个新的城市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依据城市经济活力的5个特征构建由6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见表1)。

2.指标选定依据及计算方法

(1) X_1 为城市集聚力,其含义为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集能力,包括人口集聚力、资本集聚力和产业集聚力等。

人口集聚力。劳动生产率随总人口密度的提升而提升。高密度的人口整合社会资源,使得公共设施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用,是对使用效率的提升。人口向特大、超大城市集中,产生空间集聚效应和

正的外部性。人口密度越高,越能促进隐性知识传播,创新可能性也就越高,更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限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意味着巨大的整体福利损失,特别是对大城市的损害。知识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今天,人口密度对于人才聚集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活力也不仅仅来自人才,普通劳动力同样重要。从创新扩散理论来看,创新从思想转变为现实不仅需要创新者,而且更需要可以使用和推动创新的人群,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撑,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和创新的方式驱动经济增长,而且数量的驱动更为重要。

年轻人更有活力,老龄化则抑制活力。人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退化是不可避免的,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活力不足也就造成了经济活力不足。居民在退休之前是个人财富创造与积累的阶段,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短缺、储蓄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常规消费需求减少并加重财政负担等问题,以致削弱经济活力。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一方面增强财政收入能力,另一方面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降低财政负担,总体上有利于财政平衡。

鉴于此,本文选定衡量人口集聚程度的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城市人口密集度(X_{11})、复合指标60岁以下人口比重(X_{12})、城市人口流动率(X_{13})和城市人口首位度(X_{14})。

X_{13} 使用每年人口流入($Population_{in,t}$)与人口流出($Population_{Out,t}$)的差值与前一年人口数($Population_{t-1}$)的比值计算,计算公式为:

$$X_{13} = \frac{Population_{in,t} - Population_{Out,t}}{Population_{t-1}}.$$

X_{14} 常规的首位度评定是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区域内人口首位城市人口数 $Population_1$ 与区域内人口第二位城市人口数 $Population_2$ 之比,计算公式为:

$$X_{14} = \frac{Population_1}{Population_2}.$$

资本集聚力。资本增加或引入资本(如FDI)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FDI会给东道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崔健,2008)。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魏后凯,2002)。外资集聚高又吸引了内资集聚,且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

表1 城市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影响方向
X1	城市集聚力	X ₁₁	城市人口密集度	评价城市密度,高密度的城市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人与人交流频率,促进了非编码知识传播等
		X ₁₂	60岁以下人口比重	45岁以下的中青年更富有创造力,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活力,而45—60岁之间的人群又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
		X ₁₃	城市人口流动率	评价城市吸引移民能力
		X ₁₄	城市人口首位度	评价人口集聚程度差距
		X ₁₅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	评价资本集聚能力
		X ₁₆	年末银行各类账户存款占全国比重	+
		X ₁₇	规模以上企业占全国比重	+
		X ₁₈	制造业集聚程度	评价产业集聚程度,使用制造业就业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X ₁₉	服务业集聚程度	评价服务业集聚程度,反映城市创造就业能力,吸引移民能力,使用服务业就业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X2	城市创新力	X ₂₁	17—45岁人口比例	这一部分人群更具创造力,也更具有冒险精神
		X ₂₂	城市科研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比重	城市创新能力的基础
		X ₂₃	科研机构数量占全国比重	+
		X ₂₄	地方财政科研支出占全国比重	评价地方政府对创新重视程度
		X ₂₅	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评价企业对创新重视程度
		X ₂₆	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	朝阳产业更具创新能力,企业数量越多越可能发生创新
		X ₂₇	行业多样性	评价包容性,开放性,多样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X ₂₈	全年专利申请数占全国比重	评价创新效果
X3	城市市场活力	X ₃₁	中小企业数量占市场主体比重	评价市场主体活跃程度
		X ₃₂	百人拥有企业数	评价市场规模
		X ₃₃	就业率	城市当前经济发展状况
		X ₃₄	企业数量增长率	市场主体变化情况
		X ₃₅	国有企业数量占市长主体比重	过多的国有企业容易造成资源垄断,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对经济活力存在抑制作用
		X ₃₆	工商企业登记办理时长	评价政府对企业活力的制约程度
		X ₃₇	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
X ₄	城市韧性	X ₄₁	抗冲击指数	评价城市抵抗冲击能力,使用城市与国家经济增速比计算
X ₅	城市经济发展成果	X ₅₁	经济增长领先度	评价经济水平程度差距,使用GDP首位度计算
		X ₅₂	经济发展领先度	更高的福利水平能够更好地吸引移民进入,使用人均GDP首位度计算
X ₆	城市辐射力	X ₆₁	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	通过区域内城市与区域整体增速对比衡量城市对区域发展产生的作用,差距大说明城市仍然处于集聚过程中,如果差距逐渐缩小,则说明城市对区域中其他城市产生了辐射作用,使用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增速比计算
		X ₆₂	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城市间福利水平差距,原理同上
		X ₆₃	交通便利度	距离是制约辐射力的客观因素,便利的交通能够促进区域间生产资源的流动,而辐射力主要就是通过生产资源流动实现的,使用人均路网密度计算
		X ₆₄	城市间关联程度	通过城市间的贸易衡量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使用城市间贸易量计算

业为主,集聚优势和正向外部性明显,使这一地区对外辐射效应增强。FDI也对自主创新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王红领,2006),特别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刘向丽,2020)。

鉴于此,本文选定衡量资本集聚力的指标包括:复合指标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X₁₅)、年末银行各类账户存款占全国比重(X₁₆)以及规模以上企业占全国比重(X₁₇)。

产业集聚力。城市的集聚首先反映在产业上。制造业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基础,没了制造业就没有基本生产设备,没有产业链条。尽管低端制造业给中国打上了“世界工厂”的标签,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提供的就业岗位,保障了居民收入,稳定了内需,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而高端制造业,意味着提升国家在核心设备上的话语权。城市服务业发展能够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具备强大的就业吸附能力。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城市中1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岗位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陆铭,2017),而且研究发现,韩国、东盟,即便是日本、德国,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比重都比美英等国低,经济活力和国民福利都要逊色一些(郭树清,2007)。由此看出,一些地区为了追求“高端”产业,盲目排斥低端服务业或者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做法恰恰是遏制了经济活力。

鉴于此,本文采用 Krugman 的空间基尼系数作为派生指标来衡量城市制造业集中程度 X_{18} 与服务业集中程度 X_{19} 。计算公式均为 $\sum_k (S_k - x_k)^2, k=1,2,\dots, S_k$ 是 k 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x_k 是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2) X_2 为城市创新力,包括城市的科研基础,产业创新能力、多样性、创新效果等。

城市的科研基础。人步入老年后就会心态保守,冒险精神不足,创业精神不足。在对公司高管的研究中发现,年龄越大的高管,风险的承受能力越低,倾向于选择风险规避,而年龄较小的高管,则充满活力、更有激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投资性、长远性的战略(Barker, 2002),更具有创新创业的热情。所以,对城市或者区域来说,吸引雄心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非常重要。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早已得到如舒尔茨、卢卡斯等学者的证实,并且实证检验也表明,中国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存在地区差异,东部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吕祥伟等,2020)。区域间人才的活跃程度差距直接导致区域间经济活力的差距;反过来,区域间经济活力差距的拉大又使得高素质的人才继续向发达地区流动。

鉴于此,本文选定复合指标城市中 17—45 岁之间人口比例(X_{21})、城市科研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比重(X_{22})、科研机构数量占全国比重(X_{23})、地方财政研发支出占全国比重(X_{24})作为衡量城市创新潜力的指标。

产业创新能力。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实证研究表明,集体学习对于集群内的创新与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有着显著的关联性(蔡宁等,2005)。能够带来更多活力的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也就是那些能使技术突破创新并以此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如 IT、环保、新能源等,不仅如此,如果有新的技术范式出现,产生技术质变,技术创新达到技术跳跃程度,并且新的技术突破与市场需求相吻合,还可以促进产业起死回生(马尚平等,2004),也就是通过创新也可以让夕阳产业再次成为朝阳产业。

鉴于此,本文选定复合指标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_{25})、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X_{26})作为衡量城市产业创新能力的指标。

多样性。接纳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思想的人们聚集于城市,思想在此碰撞,也让城市注定成为创新的集结地,创意的孵化器。有多样性特征的城市凭借自身活力的内向型持续发展的成长模式,可以提升城市自身的活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从亚里士多德到雅各布斯都认为多样性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并且多样性也促进了创新,因为多样化个体的空间集聚导致了大量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新思想、新产品和新过程的产生。知识是在产业间溢出的,而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城市的大规模能够汇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促进了思想的扩散、知识的传播,推动了创新。

多样性是一个较难获得的指标,本文采用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 HHI)作为衡量城市多样性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X_{27}=f_i\left(1-\sum_{n=1}^{N_k} S_{i,n}^2\right)$, N_k 为城市 i 的行业种类数。 $S_{i,n}$ 为城市 i 第 n 类行业就业人员与该区域所有就业人员的比值, f_i 为区域 i 就业人口数与该区域总人口数的比值。

创新效果。申请专利数量是城市创新产出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鉴于此,本文选定全年专利申请数占全国比重(X_{28})作为衡量城市创新效果的指标。

(3) X_3 为城市市场主体活力,包括市场主体活力以及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影响等。

市场主体活力。创业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通过知识溢出等进行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出现,能激活企业竞争,增加经济活力,在净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新兴和年轻的企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altiwanger, 2014)。

在中国刚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向的阶段,我们所强调的仍然是提升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认为如果不把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搞活,就无法释放巨大生产力,整个国民经济就不能活起来(程兆汾, 1984)。但是中小企业多为创新创业型的企业,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逐步增强(王叶军, 2019),在增加就业、提高竞争强度、加强整个经济的活力、通过与大企业的互补关系形成更有效率的生产体系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选定中小企业数量占市场主体比重(X_{31})、百人拥有企业数(X_{32})、就业率(X_{33})、企业数量增长率(X_{34})4个指标作为衡量市场主体活力的标准。

政府对市场主体影响。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中国长期存在,而非公有制是增强经济活力的关键。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非公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严重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尽管中国曾经受困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致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也被认可。国外早期的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市场不稳定不成熟,但是却是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市场(Sun、Tipton, 1998)。服务型政府建设体现了中国政府培育市场主体的意识。政商之间以税收优惠、贷款便利、政府补贴等的主动关联则有利于企业减轻负担、获取更多资源。

鉴于此,本文选定国有企业数量占市场主体比重(X_{35})、工商企业登记办理时长(X_{36})、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X_{37})三个复合指标作为衡量政府对企业活力影响的指标。

(4) X_4 为城市韧性。

X_{41} 城市韧性衡量的是城市对于冲击的抵抗能力,使用城市GDP增速与国家GDP增速比值的复合

指标衡量,计算公式为: $X_{41}=\frac{GDPRate_{city}}{GDPRate_{country}}$ 。 $X_{41}>1$ 时,说明城市更具有抵抗冲击能力。

(5) X_5 为城市经济发展成果。

经济发展首先实现的是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随后实现的是福利的提升,也就是人均GDP增长,这就是城市经济活力提升的目的。如果区域内GDP与人均GDP排位第一的城市与排位第二的城市之间差距越大,则说明首位城市发展的越好。

鉴于此,本文选定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两个复合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领先度(X_{51})和经济发展领先度(X_{52})为衡量标准。计算公式为: $X_{51}=\frac{GDP_1}{GDP_2}$;

$$X_{52}=\frac{PerGDP_1}{PerGDP_2}。$$

(6) X_6 为城市辐射力,是城市对于周边腹地发展的带动作用。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城市作为区域中的增长极,首先要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对周边腹地的辐射,所以本文将城市辐射力作为最后一个一级指标。

X_{61} 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考察的是城市与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速差距,计算公式为 $X_{61}=\frac{GDPRate_{city}}{GDPRate_{region}}$,比值增大则说明城市发展仍然处于聚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吸收外部资源进行发展;而结果如果呈现出收敛,则说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开始追赶增长极,城市发展处于辐射周边,也就是带动周边发展的阶段,使用GDP增速衡量。

X_{62} 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即人均GDP差距),计算公式以及结论与 X_{61} 相同,但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成果,因为不论是城市,区域还是国家,最终发展的目标视为了提升人民福祉,所以人均GDP是经济活力必须考虑的内容。

因为辐射不是单向的,而是中心—腹地的双向辐射,所依靠的是两地之间的要素、产品等流动来实现,所以两地之间的距离成为制约辐射力的客观因素。越便利的交通,越能更好地实现两地之间的双向辐射。 X_{63} 交通便利度指城市到达周边地区所用的时间,使用复合指标人均路网密度衡量。

X_{64} 城市间关联程度是一个通过产出与距离来计算的派生指标,由丁伯根贸易引力模型而来,即两个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各自的经济规模成

正比,与之间的经济距离成反比。计算方式为:

$$X_{64} = \frac{KGDP_iGDP_j}{(D_{ij})^2}, i, j=1, 2$$
。其中 GDP_i 、 GDP_j 分别表示城市 i 、城市 j 的 GDP , K 为常数, D_{ij} 表示两座城市之间距离,说明城市间的关联程度与城市 GDP 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两地之间的贸易量越大,说明两地之间联系越紧密。

从现有文献看,对城市软硬环境评价(如城市营商环境的排名)的分析研究较多,还没有看到有学者提出完整的评价城市经济活力的指标体系,本文以上提出的从5个维度对城市经济活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只是学理上的尝试,其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三、提升城市经济活力的根本途径: 建设“五个友好”的城市社会

前文已经对城市经济活力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的总体看法是,要提升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活力,需从更多注重微观上升到更多注重中观和宏观,使微观与中宏观结合,特别是要着眼于优化城市整体环境,激发城市的整体活力,让城市间开展最广泛也最有效的活力竞争。提升城市整体经济活力,必须坚持“五个友好”原则,同时,要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上下功夫,着力增强城市中心与腹地的关联性,促进“极大模式”向“极强模式”转换。

1.优化城市整体环境,必须坚持“五个友好”原则

一是坚持居民友好原则。居民友好,就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位后形成的居民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居结构合理、民生保障有力、人们生活质量普遍大幅提升的状态。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规模上竞赛,往往导致居民关注的包括环境质量、公共产品质量等诸多问题被明显忽略,影响了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人是经济活动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水平最终也是要以人的福利来评判,人的活力最终反映在经济活力上,这也让居民的福祉成为提升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居民友好型地区应注重协调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距离,使其在空间上形成均等化的生活服务空间,以满足居民普遍性和迫切性的共性需求,优化设施空间配置的精准性,依次满足各群体更高层次

的个性需求;通过不同功能空间的规模、结构以及布局调整,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使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是坚持创新友好原则。就城市发展来讲,创新友好,就是创新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普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新创业的环境不断优化。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要加强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使传统产业得到提升改造,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设备更新,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工业“互联网+”,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推动制造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紧跟世界前沿科技,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卡;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快实现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通产学研一体化各个环节;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培植科技创新基础。

三是坚持市场友好原则。市场友好,就是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在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中努力打破一切分割市场、人为垄断市场的行为,使各种传统的和新的要素充分自由有序地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友好需要加快打破区域竞争造成的市场分割,消除制度壁垒和贸易壁垒;持续深化“放管服”等改革,合理、适度和审慎地进行政府干预,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削弱、弥补市场经济缺陷,提升市场化程度,加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动态互补,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四是坚持生态友好原则。生态友好,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尊重自然法则,不仅要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而且要按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原理,建立基于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人工生态系统,优化人居环境。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建立生态文明责任体系;依照区域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整体情况,在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性和破坏性降到最低的条件下,促进经济的增长,加大力度打造高科技、高效益、低消耗的循环经济体。

五是坚持开放友好原则。开放友好,不仅是指对区域外的系统开放,包括对国际市场开放和对国内所有其他地区的开放,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包容性社会,形成多元共生的经济文化,海纳百川、聚四方英才。开放包容的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的集聚和创新能力,但是当前中国户籍制度、落户制度、地方保护思想、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等都遏制了城市的开放性。为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要尽快改革户籍制度,尽快取消对人口流动的不合理限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吸纳不同知识水平、不同地域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员,培育多样化的产业,实现不同优势间的相互促进,优势与劣势之间的相互补足。

2.激活城市经济活力,须从五个方面促进城市结构优化

第一,促进要素向城市产业发展核心区集中,形成强大的增长极。城市作为功能强大的经济动力源,其重要标志就是各种要素不断集聚共生,产生越来越丰富的多样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形成强大的极化效应,进而形成创新力和辐射力。形成强大的增长极需要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就外部因素来讲,需要提高城市周边基础设施的质量与改善通达性,如高速公路的大量增加,促进了原来大城市特别是居于政治中心的省会城市的要素集聚,还有就是国家政策的作用,如划定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相应的鼓励政策就会促进其他地区的要素向这一重点地区集聚。就内部因素来讲,主要是决定于城市发展空间利用模式,采取集约化、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规律的模式。如果采取集约化、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规律的模式,就会有利于并加快极化效应的增长;相反,如果采取粗放式的、逆城市空间布局规律的模式(“摊大饼”),就会阻碍极化效应的增长。我们把前者称为“极强模式”,而把后者称为“极大模式”。“极大模式”的最大问题是空间效率严重偏低,影响了经济的扩张和升级,因此,其很容易遇上发展的“天花板”,因为像大海中的行船,船表面积越大,阻力越大。而“极强模式”从理论上讲由于创新的动能是无限的,因此仍有极大的成长空间。从“极大模式”到“极强模式”并不会自动发展形成,必须做重大的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和政策机制的调整,既要继续强化集聚效率,更要使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特别是要注重城市多样性的混合。

第二,优化城市人居结构,建设形成强大的“空间转换器”。有了强的城市极化效应,在理论上就具有了强大的辐射力,但这种强大的辐射力要想转化为区域协调能力,即最大化地扩张城市腹地发展的能力,为城市进一步扩张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市场、产业、原料和空间支撑,就必须借助某种区域载体(郊区和远郊区)实现空间转换,这种区域载体就是“空间转换器”,在郊区或远郊区与城市市中心区之间形成合理的人居结构,也就是让城市人口规模呈现Zipf法则的分布形态,城市中心高,向外围呈现幂级递减规律。但是当前中国人为硬性地控制城市规模,违背了这种规律。当前要做的是取消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硬性限制,强化人口的自由流动。当城市收益与自身付出成本相同时,迁移便停止,人口分布也就能够呈现出应有的逐层幂级承接态势。

第三,着力形成发达的交通联系和服务网络。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强大的腹地形成和强化城市中心区极化效应的必要条件。因为市场分割更多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交通地理阻隔和运输成本的增加。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积极打造综合交通、服务网络,是打破市场分割的必要先行政策。强化各种交通运输、服务方式有机衔接,构建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既可以实现外部要素自由有序进出的通道,也是内部要素能够有机耦合的基础,有助于实现打破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分割以及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第四,实现市场高度一体化。建立不断完善的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既是城市或区域极化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辐射效应能有效促进强大腹地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心城市与腹地有时处于同一行政区域内,这种情况下,市场一体化和政策协调就相对容易,但在许多情况下,大城市周边潜在腹地十分广袤,常常超过了大城市的行政边界,甚至跨几个同级行政区,这些同级行政区之间,可能出现许多不同形式的壁垒,阻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壁垒有的来自具有巨大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也有的是来自落后的被辐射的潜在腹地地区的政府或其他保守性力量。只有消除了各类显性或隐性的市场壁垒,城市增长极才能有效地实现向腹地的辐射,从而促进腹地的扩张和发展。

第五,提升腹地发展能力,促进腹地与中心城

市形成强大的辐射与支撑效应。腹地发展具有一定被动性,但也可以是主动作为的结果,因为发展是所有地方和所有人追求的共同目标,发展就是要打破原来的低水平均衡或任何水平的发展陷阱(一个地区只要失去了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什么时候、什么水平的经济都可能进入长期性的停滞或衰败)。发展较为落后的腹地应该采取主动作为的方式,对内部经济发展做重大的战略改变,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积极与外界对接,吸引经济资源或政策资源,实现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 [1]Barker V L, Mueller G C.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R & D Spending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2 (48) : 782—801.
- [2]Haltiwanger J, Hathaway I, Miranda J.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S. High-Technology Sector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February 2014.
- [3]Sun H, Tipton 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1979—1995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1998, 32 (2):159—186.
- [4]楼海森,孙秋碧.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各省经济活力评价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5]刘向丽.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J].对外经贸,2020(7).
- [6]吕祥伟,辛波.人力资本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其溢出效应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4).
- [7]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J].经济研究,2007(12).
- [8]孔淑红,曾铮.国际投资学(第二版)[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 [9]金延杰.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J].地理科学,2007(1).
- [10]程兆汾.经济体制改革和增强企业活力[J].财经研究,1984(6).
- [11]蔡宁,吴结兵.产业集群的网络式创新能力及其集体学习机制[J].科研管理,2005(4).
- [12]崔健.日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提高经济活力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8(3).
- [13]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
- [14]王叶军.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19(2).
- [15]王小广,黄征学,覃成林,等.区域经济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J].区域经济评论,2020(4).
- [16]王延中.中小企业与经济活力[J].中国工业经济,1995(10).
- [17]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
- [18]孙津.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6).
- [19]张世龙,马尚平.技术突变与产业调整[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8).
- [20]蒋涤非.城市形态活力论[M].南京: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 [21]陆铭著.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22]马尚平,张世龙.论产业生命周期[J].江汉论坛,2004(6).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ion Proposals

Wang Xiaoguang Liu Yi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 will b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city brings the vitality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due to its complex connotation, there are few existing researches on it. This paper holds that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has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gathering power, innovation power, market vitality, resilience and radiation power.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economy, especially the urban economy,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so and macro from the micro level, so as to combine the micro and macro, especially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stimulate the overall vitality of the city, and enable the most extensive and effective vitality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Key Words: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Gathering Power; Indicator System; “Five Friendly” Principles

(责任编辑:柳 阳)